

●顧問：顧廷龍 戶川芳郎
●主編：王寶平
●副主編：李國慶
●杭州大學出版社

中國館藏日人漢文書目

九三愛顧廷龍題



日本文化研究叢書

中方顧問 沈 善洪

日方顧問 石田一良

主 編 王 勇

日本文化研究叢書
中國館藏日人漢文書目

王寶平 主編

*

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天目山路 34 號)

*

杭州大學出版社電腦排版部排版

浙江印刷集團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開 19.75 印張 500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書號:ISBN7-81035-697-6/G·232

定 價:35.00 圓

中國的日本研究：一個簡短的回顧

——代叢書序

中國歷朝正史對日本的記載，不失為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貴史料；但《宋史》（14世紀）以前的官撰史書，均把“日本傳”歸入四夷之部，故盡管記奇風異俗、朝貢封賜頗詳，其本身還稱不上是對日本的研究。

明代，日本研究形成第一個高潮。《明史·日本傳》自不待言，書名冠以“日本”的著作亦競相問世。僅以嘉靖至萬歷約百年為例，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舉出《日本考略》、《日本圖纂》、《籌海圖編》、《日本考》、《日本一鑒》、《經略復國要編》等，現已佚散的估計數量也很可觀。明朝異乎尋常的日本研究熱，究其原因，與倭患觸發的海防關係密切，《日本考略·自序》云：“於茲猥屬為《考略》，以便御邊將士之忠於謀國者究覽。”可見這些著作類似於敵國便覽，偏重於概況羅列，而輕於研究探討。

迨至清季，在西方文化反復衝擊下，古老的漢字文化圈漸趨解體，尤其是日本率先維新成功，踏上“脫亞入歐”之路，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國自居的中國，不得不刮目視之。在這種背景下，清代出現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依賴文獻和傳聞研究日本的時代遂告結束，中國人終於走出國門，通過實地體驗，為後世留下豐富的訪日記錄，如《日本日記》、《使東述略》、《使東詩錄》、《日本紀遊》、《談瀛錄》、《遊歷日本圖經餘記》、《東遊日記》、《扶桑遊記》、《遊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遊歷日本考察農務日記》、《愚齋東遊日記》等等，無

論數量還是質量，均是前代所無法相比的。然而，細讀這些訪日見聞，發現中國人所關注的，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層面，而非傳統的思想文化，故可謂之“曲綫的西方研究”。當然也有例外，如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堪稱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豐碑。

千餘年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已經達到巨細無遺的地步；反觀中國，自古以“華夷”色鏡視人，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時，恍然猶如隔世，弱鄰竟成強虜。甲午一戰，“泱泱大國”敗給“蕞爾小國”，從此中日反目成仇，更失去了客觀研究對方的基盤。黃遵憲在《日本國志自叙》中發過慨嘆：“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大夫好讀古書，足已自封，……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此種狀況至民國更甚，戴季陶有感於“中國”這個題目被日本人無數次解剖、化驗，而國人不願讀日本字、不願聽日本話、不願見日本人，更談不上什麼研究，於是發軔寫了部《日本論》，算是填補了空白。清末以降，國人負笈東遊者劇增，他們通過日語翻譯了大量西學書籍，卻很少有專門研究“和學”的。“五四”前後，周作人、錢稻孫等致力於介紹日本文學，因囿於文人士夫圈子，終未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隨着戰後日本經濟的奇迹般騰飛以及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長期困擾日本研究的兩大障礙——“華夷思想”與“敵國意識”漸被清除，短短數年時間，大學的日語專業成倍增加，各種研究機構紛紛設立，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熱潮，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席卷全國。尤其是近十年來，有關日本的翻譯、著作、論文以幾何級數猛增，這表明“日本”這個題目，終於被中國人放到手術臺上認真地解剖了。稍嫌不足的是，解剖的部位存在明顯的偏向，即語言文學、政治經濟等分野人才濟濟、碩果累累，而藝術、民俗、思想、宗教、社會等廣義的文化領域則門庭冷落，鮮有人涉足。

對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很難作出精確的界定，或可比作對“日本”這個题目的綜合解剖。從局部研究過渡到綜合研究，是日本

研究的又一次質的飛躍，其重要性漸為人們所認知，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自 1985 年始設日本社會文化碩士專業，杭州大學於 1988 年承辦日本文化史大學師資培訓班，均為日本文化研究的勃興蓄積了人才。鑑於國內迄今尚無一塊屬於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學術園地，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這套叢書，顯然正逢其時。但願這套叢書能為日本文化研究搖旗吶喊，為中日文化交流添磚加瓦。

本叢書聘請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顧問，日本思想史學會名譽會長石田一良博士為日方顧問，主編由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擔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日常編務。

編 者

1990 年 10 月

撰稿人及藏書單位簡稱表

01	李際寧	北京	北京圖書館
02	閻中雄	首都	首都圖書館
03	王海燕	科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04	滕軍	首都師大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
05	楊長虹	民族	中國民族圖書館
06	梁芳	醫科	中國醫學科學院圖書館
07	李玉	北大	北京大學圖書館
08	葉桔	清華	清華大學圖書館
09	方學堯	人大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10	丁良	民族大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
11	王宏	上海	上海圖書館
12	沈達偉	復旦	復旦大學圖書館
13	鄭麥	華東師大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14	胡宗英	上海師大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
15	王有朋	辭書	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
16	陳藝	上海中醫	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17	秦麗娜	天津	天津圖書館
18	陳作儀	南開	南開大學圖書館
19	高洪鈞	天津師大	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
20	靳淑霞	山西	山西省圖書館
21	靳淑霞	山西大	山西大學圖書館

- | | | | |
|----|------|------|--------------|
| 22 | 韓錫鐸 | 遼寧 | 遼寧省圖書館 |
| 23 | 王 若 | 大連 | 大連圖書館 |
| 24 | 盧光綿 | 吉林 | 吉林省圖書館 |
| 25 | 周誠望 | 黑龍江 | 黑龍江省圖書館 |
| 26 | 何俊芳 | 黑大 | 黑龍江大學圖書館 |
| 27 | 黑 社 | 黑社 |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
| 28 | 黑中醫 | 黑中醫 | 黑龍江中醫學院圖書館 |
| 29 | 哈爾濱 | 哈爾濱 | 哈爾濱市圖書館 |
| 30 | 哈師大 | 哈師大 | 哈爾濱師範大學圖書館 |
| 31 | 哈醫大 | 哈醫大 | 哈爾濱醫科大學圖書館 |
| 32 | 齊 市 | 齊市 | 齊齊哈爾市圖書館 |
| 33 | 齊市師院 | 齊市師院 | 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圖書館 |
| 34 | 大興安 | 大興安 | 大興安嶺地區圖書館 |
| 35 | 韓國輝 | 白求恩 | 白求恩醫科大學圖書館 |
| 36 | 徐大平 | 陝西 | 陝西省圖書館 |
| 37 | 李慶濤 | 青海 | 青海省圖書館 |
| 38 | 王明秀 | 山東 | 山東省圖書館 |
| 39 | 邱夢英 | 山大 | 山東大學圖書館 |
| 40 | 曲 玲 | 青島 | 青島市圖書館 |
| 41 | 陸忠海 | 南京 | 南京圖書館 |
| 42 | 蔣一斐 | 南大 | 南京大學圖書館 |
| 43 | 陳玉蘭 | 蘇州 | 蘇州市圖書館 |
| 44 | 趙 明 | 蘇大 | 蘇州大學圖書館 |
| 45 | 徐由由 | 浙江 | 浙江圖書館 |
| 46 | 謝志宇 | 杭大 | 杭州大學圖書館 |
| 47 | 鄒向東 | 天一 | 寧波市天一閣文保所 |
| 48 | 丁良敏 | 寧波 | 寧波市圖書館 |
| 49 | 丁澤洪 | 安徽 | 安徽省圖書館 |

50	傅 桔	安大	安徽大學圖書館
51	黃源海	江西	江西省圖書館
52	李秉乾	廈大	廈門大學圖書館
53	李古寅	河南	河南省圖書館
54	石洪運	湖北	湖北省圖書館
55	廖源蘭	武大	武漢大學圖書館
56	蕭鳳生	湖南	湖南省圖書館
57	林子雄	廣東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58	蘇 威	中大	中山大學圖書館
59	陳錦釗	廣西	廣西省圖書館
60	李達麟	桂林	廣西桂林圖書館
61	彭邦明	四川	四川省圖書館
62	李榮慧	川大	四川大學圖書館
63	楊 林	成都	成都市圖書館
64	屈禮萍	重慶	重慶圖書館
65	趙紅川	北碚	北碚圖書館
66	陳 琳	貴州	貴州省圖書館
67	沈繼延	雲大	雲南大學圖書館
68	董馥榮	北京分館	北京圖書館分館

序

我撰此序，是因為我與本書主編王寶平君有着師生情緣之故。

1989 年秋至 1991 年春，我在北京任中日兩國政府合辦的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寶平君當時正開始撰寫有關盧以緯的《助語辭》及須賀精齋的《助語辭講義》的碩士論文。我在編纂《漢語文典叢書》（7 冊，汲古書院，1978～1981）時，曾在解題中論及明人胡文煥編刻的《格致叢書》以及收入該叢書中的《助語辭》一書，由此希望王寶平君能從廣闊的出版文化背景進一步深入搞清《助語辭》以及紛繁複雜的《格致叢書》的版本問題。王寶平君在早稻田大學期間，遍訪日本各大圖書館，在徹底調查的基礎上，先後發表了《日本胡文煥叢書經眼錄》（《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年）、《中國胡文煥叢書經眼錄》（《中日文化論叢——1991》，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年）、《〈助語辭〉及其在江戶時代的流布與影響之文獻學研究（一）（二）》（日本《汲古》第 21 號、第 22 號，1992 年）等系列論文。他的論文搞清了《格致叢書》的種數、《格致叢書》與《百家名書》關係、《助語辭》的版本、傳日時間以及在日的影響等重大問題，成為這方面的權威性論文。

正是在從事該課題研究過程中，王寶平君逐漸走上文獻目錄學研究的道路。自此五年後，他編纂了《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年）。

長期以來，在引進中國大陸文化之時，日本書商為了滿足社會的大量需求，將漢籍施以簡便的訓讀標點進行了大量的翻刻。這種

被稱之爲“和刻本”的漢籍在當時非常盛行。

關於和刻本的定義和範圍，長澤規矩也氏在其《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及其《補正》中有着詳細的論述。而實際將和刻本著錄編目的代表作則爲《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東京堂出版，1995年）。該書廣收數量龐大的子部“釋家類”和“醫家類”書目，而這些和刻本在長澤的目錄中則厥如。因此，在這點上，東大的該目錄可以說是提供了著錄漢籍以及和刻本漢籍的一個標準樣本。與東大幾乎同時，王寶平君編的《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亦仔細地著錄了“釋家”、“醫家”書目，可與東大目錄相媲美。

《中國館藏日人漢文書目》在前書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範圍，收載 1712 年以前日本人編纂的漢文著作。所謂日人漢文著作首先應指對漢籍原典進行註釋的書籍，舉上述盧以緯《助語辭》之例來說，有毛利貞齋《重訂冠解助語辭》等書。而經解類著作如松平賴寬《論語徵集覽》、釋空海《般若心經秘鍵》、伊藤馨《傷寒論文字考》等則往往被排斥在和刻本漢籍目錄之外。鑑於此，我們在編纂《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之初就認爲這些日人漢文書籍應予以收錄，現在，東京大學圖書館正在從事這方面圖書的編目工作。

王寶平君以充沛的精力編纂了此書，做了日本應着先鞭的工作。通覽全書，江戶時期自不待言，日本在明治初期至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期間，撰述、出版了如此多的漢文著作，令人瞠目，她將成爲我們反思近一個半世紀日中兩國近代化歷程的有力材料。當我們拜訪中國圖書館，手捧這些保存良好的書籍時，不由會對王寶平君及其同仁所付出的艱辛充滿感激之情。

戶川 芳郎

1996 年 12 月 8 日

日本典籍^①在歷史上的中國

一、逸書之國概念的形成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古往今來，過從甚密。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日本的國家，自《山海經》起迄今，歷史上留下了大量的有關記載、研究日本的文獻。但是，受種種因素制約，這些文獻多偏重於地理、風俗等內容的記載，而對書籍一項往往語焉未詳。《宋史·日本傳》首先彌補了這一缺陷：

雍熙元年(984)，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並其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中略)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教、《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下略)。^②

裔然此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日本知識，給中國留下了日本藏有豐富的中國逸書的深刻印象。這種印象又由於《宋史》的正史性質而得以超越時空，廣為傳播。以致後代文獻對此津津樂道，競相引用：

《元史·日本傳》：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

卷。(下略)^③

《日本考略》(嘉靖九年,1530年序):雍熙元年,平天遣裔然與其從五人獻銅器十餘事,並《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下略)^④

《日本一鑑》(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成):按《宋史》,雍熙間夷王守平遣僧裔然來貢,云(中略)國中多中國典籍,有五經、佛書、《白居易集》七十卷。(下略)^⑤

《殊域周咨錄》(萬曆二年,1574年序): (日本)初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皆得之中國。(下略)^⑥

宋亡元興,忽必烈二度入侵日本,元日關係惡化;入明,倭寇擾邊,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明日關係險惡。概而言之,元明二代中日官方文化交流中斷。有清一代,征天下奇書,編《四庫全書》,收《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卷(山井鼎撰,物觀補)、《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太宰純音釋)。雖然種數遜於韓國^⑦,但影響巨大。繼之,《佚存叢書》(16種,林衡編)等漢籍相繼回歸,時值乾嘉考證學如日中天,極大地迎合了學界渴求逸書之需,歡迎如潮: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考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彬,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下略)

龔自珍(1792—1841)的這封《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⑧充分表達了同時代文人的喜悅心情和對日本的向往。他的“一客談遺佚,日挾十錢入西市,五錢麥糊五錢紙,年年東望日本使。”^⑨之詩更說明訪

求佚書已決非龔氏等少數人的行爲。日本爲佚書之邦的形象已深深扎根於廣大文人的心目中，只等時機成熟，就將付諸於實踐中去了。

二、尋訪逸書

中國赴日訪書之舉自古有之，而日本明治維新後才始成規模。黎庶昌的《古逸叢書》、楊守敬的《日本訪書記》、孫楷弟的《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董康的《書舶庸譚》等已爲世人耳熟能詳，現舉一鮮爲人知的事例。日本外交史料館藏有《在本邦清國公使請求膳寫足利學校所藏皇侃論語義疏一件》之檔案（索書號：7-1-6-2），它生動地記錄着中國公使館訪求逸書的感人事跡，現簡介如下：

1887年8月15日，中國駐日第三任公使徐承祖致函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內云：

昨準總理衙門來文擬借貴國足利學校所藏《皇侃論語義疏》一書照鈔發刊，以廣流傳。當派隨員姚文棟前赴該學校商借，據該學校幹事委員面稱，須請橡木縣（引者註：即栃木縣。“栃爲‘橡’之日本‘國字’”）之命方可借出等語。本大臣並聞該學校尚有宋刻及古寫各種舊書，茲將書名另單開明附上，即祈貴大臣轉知橡木縣知事轉飭該學校委員將單開各書借送敝署一觀，容俟擇要鈔出即當歸繳無誤（下略）。

徐承祖同信所附書單全文如下：

計 開

皇侃論語義疏二十卷 古寫

尚書孔氏傳十三卷 古寫
 毛詩鄭氏箋二十卷 古寫
 古文孝經一卷 古寫
 孟子註疏十四卷 古寫
 周易註疏十三卷 宋刻
 尚書註疏二十卷 宋刻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宋刻
 附釋音毛詩註疏二十卷 宋刻
 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宋刻
 巾箱本周禮鄭氏註十二卷 宋刻
 文選六臣註六十卷 宋刻
 足利學校藏書目一冊

凡 12 種，皆古寫、宋刻本，外加書目一冊。足利學校所在地栃木縣接到外務省的文件後，知事樺山資雄 8 月 19 日回函，以足利學校藏書向不外借為由予以婉拒。8 月 26 日，徐氏再次致信井上，云：

（前略）《皇侃論語義疏》一部係總理衙門來文囑向貴大臣設法商借。本大臣可以作保決不至損壞遺失，尚祈貴大臣再賜力商。栃木縣務將《皇侃論語義疏》一書推情允借，當在敝署謹慎鈔寫，一俟鈔畢，即當奉還無誤。手此復懇（下略）。

翌日，井上復函，認為該校既有此規，“栃木縣知事亦似不能枉成規”^⑩，建議公使館“派員到往該校鈔寫”。8 月 31 日，徐氏復致函井上，表示“遵示即派敝署隨員姚文棟帶同書手前往該校鈔錄”。但外務省卻回信稱：

頃接覆稱(引者註:指橡木縣回函),該校所藏之書,世所罕有,以是尤慎保存,今若於該校內而交諸他人之手鈔錄,則向來援以為例,效其顰者紛紛而起,散逸之患由此生矣,緣是難應貴需。

足利學校恐開此先例,後人爭而效之,不利古籍保護。雖此,外務省又網開一面,獻策曰:“因已蒙懇囑,可令該校看守之人鈔寫。”11月30日,足利學校遺跡保護委員會根據中方要求開出估價單:

記

足利學校藏本 梁國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一論語義疏 古寫本 拾冊 紙數凡三百六十葉用紙上
等美濃半面九行有細字
右膳寫料並校考紙代諸雜費共
一金七拾五圓
從着手之日起約五十日落成

後因徐承祖期滿歸國在即,足利學校加急費時三周鈔成。徐氏對日本的鈔本甚感滿意,“是書鈔寫精細,該學中執事勤勞,可知從此傳之漢土讀者必思所由來矣”,並許以三百重金予以獎勵。緊接着,徐氏又提出派人校對:

惟是聖經儒疏,苟有一句與今本不同,皆學者所當考訂。即一字形體之殊亦學士大夫所極講求,使讎校稍有未到則雖得至瑤,猶有遺憾。且亦非貴國廣其傳之本意也。千載一時之盛不得不加以鄭重復校一過。

徐承祖卸任後,黎庶昌接任此事,他在派隨員徐致遠前往校對

的介紹信中，高度評價足利學校立法嚴格，篤守古籍：

我國乾隆中於揚鎮、浙江等處設立三閣，頒貯四庫書籍，聽人入觀鈔寫，但其書列不出閱，立法極善。私家似此者亦多有之，而范氏天一閣最顯，行之數百年至今勿替。今觀日本足利立法與中國同。且自變法以來，周孔之學日就衰廢，獨足利舊藏書籍篤守弗失，誠為吾道千鈞一髮之寄。

此事一波三折，自 1887 年 8 月至翌年 3 月，歷時半年有餘，假二屆公使之手，公使館、外務省、栃木縣三者之間來往信函數十通，終成夙願。中國訪書熱情之殷切，學風之嚴謹，足見一斑。同時也說明尋訪逸書已不止於學者、商人的個人行為，亦成為官吏的一項職任。

三、日籍的記載

日本典籍散見於中國各種文獻史料中，如《楊文公談苑》載有日僧寂照提供的書目等等，但據筆者所知，最早大量介紹日本典籍的當推明代《日本一鑑》。該書作者鄭舜功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受浙江總督楊宜派遣，奉禁倭之使命赴日與豐後（今九州）當局交涉，歷時半年。回國後，撰就《日本一鑑》一書。在這部日本研究專著中，他率先設置“書籍”（《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四）一欄，專論日本書籍。鄭氏首先簡介日本向中國求佛教、醫學、天文、音樂、占卦、繪畫等方面書籍的歷史，而後列舉了 43 種收藏於日本的中國漢籍，如《史記》、《十九史略》、《翰墨大全》、《太平御覽》、《醫書大全》等，經史子集，各部皆有。最後又列舉了日人撰著作（地圖）30 種，（其中《史記》係中國書，實際為 29 種）如《行基圖》、《職員錄》、